

近十年中国主流电影发展与创作特征研究

陶 洋 (Tao Yang)¹, 李彩霞 (Li Caixia)²

摘要: 进入 21 世纪, 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 并逐步趋向成熟。尤其是近十年来, 中国主流电影取得了显著成绩, 《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长津湖之水门桥》等一系列现象级主流大片均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佳绩。它们在类型化叙事、市场化运作等方面实现了有机融合, 有效实现了主流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统一。本文在厘清中国主流电影内涵的基础上, 探究相较于传统主旋律电影, 中国主流电影在创作特征上所展现的新面貌与变革, 以期洞见中国电影未来创作的动向。

关键词: 主流电影; 创作特征; 爱国主义; 微宏叙事

Titl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ainstream Cinema in the Past Ten Years

Abstract: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has accelerated and gradually matured. Especially in the past decade, Chinese mainstream movi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ith a series of phenomenal mainstream blockbusters such as *Wolf Warriors*, *Operation Red Sea*, *The Wandering Earth*, *The Battle at Lake Changjin* and so on, all of which have reaped double wins in terms of box office and reputation. They have achieved organic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typological narrative and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effectively realizing the unity of mainstream values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ainstream mov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w outlook and changes in the crea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mainstream movi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lodramatic movies, with a view to gaining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creative trends of Chinese movies.

Keywords: Mainstream Film; Creative Identity; Patriotism; Micro-Macro Narrative

引言

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 中国电影产业在媒介技术革命与市场格局重构的双重驱动下, 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多样性, 中国电影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类现象级主流大片, 如《智取威虎山》(2014 年)《战狼》(2015 年)《湄公河行动》(2016 年)《红海行动》(2018 年)《流浪地球》(2019 年)等深谙年轻观众心里诉求与审美偏好的影片层出不穷。它们实现了对传统主旋律电影原有创作框架和范式的拓展, 在主题提炼、叙事策略、人物塑造、价值理念及美学风格等创作层面日益成熟, 也因此赢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和良好的社会口碑。回顾过去, 从

¹ 陶 洋 (Tao Yang),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影视传播与视觉文化。电邮: 529719835@qq.com。

² 李彩霞 (Li Caixia) (通信作者),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影视艺术与传播方向。电邮: licaixia1@nbu.edu.cn。

《集结号》（2007年）到《战狼》（2015年），再到《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年），中国主流电影将主流价值观与类型化叙事、商业化包装进行有机融合，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青年亚文化、互联网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探索出一种将主流文化价值表达与主流电影观众完美对接的新范式，也为中国电影的文化输出和市场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通过厘清主流电影的概念界定及其文化内涵，对主流电影在创作层面所展现出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解读，探讨其叙事策略，以期进一步把握主流电影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主流电影的艺术创作实践。

一、中国主流电影：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融合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呈现出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显而易见的‘鸿沟’：主旋律电影往往不商业、不艺术；商业电影往往不主旋律、不艺术；艺术电影往往不商业、不主旋律。”（尹鸿、梁君健，2018，p.82）进入新世纪，受全球化文化环境、政治架构及国际态势等多维度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电影产业着手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并致力于艺术创作领域的新模式探索与创新发展。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开始互相靠拢、互相融合，传统三分视野下的三种电影如今早已形成非常普遍的互动关系，它们已经不能概括当下国产电影的面貌。学者饶曙光与李国聪（2017，p.20）认为：“在不断的发展迭代中，浸润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审美观的‘主流电影’及时提出，以提倡兼容并蓄的创作方法与各取所长的生产策略打破了原有话语形态间的桎梏，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目前学界对于“主流电影”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陷入一种驳杂态势，但对于一点达成了普遍共识：主流电影是“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电影样式”（周斌，2012，p.48）具体而言，主流电影是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融合，是核心文化与商业性的统一，它需要在遵循市场规律和尊重创作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传播主流文化、塑造国家民族形象，推动市场和文化的共同繁荣。

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处境规定着我国电影想要迈向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就必须率先遵循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其次才是艺术规律、审美规律。从历史的视角审视，自电影问世以来，它即被视作一种普及于民众的娱乐消费品。实际上，不论在欧洲或是美国，电影领域的先驱人物首要关注的还是电影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潜力。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韩国电影业取得了对好莱坞电影的显著优势，这一成就的核心经验同样也在于其致力于创作具备广泛吸引力、高度商业化且贴近大众口味的电影作品。当下，中国主流电影倘若不具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无法获得理想的市场回报，那么也就失去了作为“主流”的意义。基于现在中国电影观众普遍年轻化的趋势，制片方想要吸引观众，除了在观念上保持开放的姿态，还要自觉尊重年轻观众的趣味和接受特点，打造一种“年轻态”的叙事美学、造型美学和网感文化。以电影《智取威虎山》为例，影片采用3D摄影技术捕捉夹皮沟激战、村庄保卫战以及坦克大战等宏大场景，巧妙地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极大地增强了观影者的沉浸式观影体验；《红海行动》《战狼II》利用水下一镜到底的打斗戏、海陆空三线调度等拍摄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影片的表现力度；《八佰》作为亚洲电影史上首部全程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电影，精准复刻了淞沪会战的历史场景；《流浪地球》更是凭借近10万平方米的庞大实景搭建和2003个精心制作的特效镜头，不仅忠实再现了刘慈欣原著中那浩瀚无垠、气势磅礴的宇宙景观，还将中国科幻电影的视觉表现力推向了新的高峰。

实际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社会文化架构中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构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下文化态势、格局、诉求等的影响呈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从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任何国家的电影都肩负着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传承功能,如何将这种功能完美植入到主流电影的叙事逻辑之中,且不会引起观众的排斥心理,这就需要确立一种符合主流文化传播规律的方式来有效传递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的承传从来都不是靠行政命令,不是靠强制手段,而是靠心心相印,以情动人。电影创作应在深刻了解、把握国家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准确表达对人民和时代的丰富情感。在发扬艺术创作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律的基础上,将文化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把和谐、仁爱等作为不同电影叙事形态共同具备的普遍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最终在作品中体现大国崛起的精神气度,弘扬大国尊严、大国气魄,用以支撑整个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使观众跟随艺术作品的叙事逻辑直接感悟到一种人性且直观的力量,对艺术作品中文化核心价值观表示认可,进而对影片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认同。(贾磊磊,2007,p.25)

二、中国主流电影的创作特征嬗变与当代转向

近年来,国产主流电影在承接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文化使用的同时,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积极与观众展开对话,力求在艺术品质、商业追求及意识导向间达成平衡,在人物设置、叙事结构、题材形式等方面有着新的创作特征和变化。

(一) 人物塑造摆脱窠臼更加多元真实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正如西部片离不开勇敢坚毅的牛仔、正直的警官、邪恶的歹徒一样,早期新中国主旋律电影也塑造了一系列定型化的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往往集中在伟人领袖、模范英雄、革命干部及科学家身上,均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道德的人,成为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例如,50-70年代,尤其是17年间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往往会通过塑造具有崇高道德的人民、英雄或领袖的政治实践来完成对他们所持有的政治立场的正面歌颂。这种定型化的设置以仰视的态度去拔高人物形象,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治宣传作用,但难以摆脱概念化、公式化窠臼,造成“高、大、全”的倾向,导致人物可敬而不可亲,完全忽视了商业市场的诉求。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新世纪的新十年里,主流电影尤其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逐渐回归理性、真实的设定,不再以“高、大、全”的形象去刻画人物,对英雄人物形象进行重构,赋予这些人物立体多元的人格魅力,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真实、有缺陷的平民英雄和另类英雄。这些英雄人物都是普通人物,来自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农民、运动员、警察,甚至是普通工人和学生。他们以近人伦的平民面貌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非凡勇气和责任担当,让观众倍感亲切。

《战狼II》,作为近十年来中国主流电影中的标志性作品,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创新,是其在票房收益与观众口碑上均取得不菲佳绩的关键要素。这部影片既摆脱了以往传统的“高大全”军

人形象，同时妥善融合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影片中的主人公冷锋既是一个具备过硬军事素养的优秀士兵，又是一个重情重义却也感情用事的男子汉。他在送牺牲战友回家时，遇见黑社会恶霸强拆已故战友的家，并对其家人进行威胁。面对此情此景，冷锋不顾军规和在场战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打伤恶霸，也因此被开除军籍。这一设定将传统单一英雄化的士兵形象在叙事功能上复归其“人性”本质，角色在“英勇战士”与“平凡个体”双重身份间灵活转换，为情感叙述提供了坚实基础的同时，也提升了观众对于角色的认同感。观众在观赏影片时，既能感受到冷锋作为军人的英勇与担当，又能体会到他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挣扎，从而增强了对角色的共鸣与认同感。影片尾声，一个精心设计的特写镜头聚焦于一本特制的护照之上，其上缓缓显现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处海外，若遇危难，请勿轻言放弃！请铭记，你的背后，站立着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一表述彰显了国家随着国力增强而肩负起的责任，同时明确传递了国家对国民的庄严承诺。这一场景不仅从民众的视角，启示观众应如何践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从国家的层面阐述了为何中国值得人民的热爱。通过这一双重维度的阐述，影片在当下时代背景下成功塑造了一部弘扬爱国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典范，实现了对观众情感的深刻触动与价值观的积极引导。

电影《湄公河行动》与《战狼》塑造的“孤胆英雄”又有所不同，它塑造了一组多元化的英雄群像。影片中的郁局作为智谋英雄，展现出精明果断的决策能力；高刚则是战斗英雄，直面敌人毫不畏惧；方新武则是潜伏英雄，擅长侦查与斡旋。这些英雄形象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影片的丰富内涵。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在情节处理上力求真实，不夸大角色光环，尊重了真实事件的原貌。例如，高刚在一次行动中，因未能在15分钟内找到目标岩多帕，导致自己和队友暴露，身陷险境；队员哪吒因粗心大意跟丢了犯罪嫌疑人，还险些丧命；顾旭因未保持高度警戒，正面中枪后导致右腿截肢；而线人方新武，在情与法的抉择中，为了替女友报仇，违背了中国警方的纪律与原则，直接枪杀了邢登。这些现实化的处理虽然打破观众的心理预设，但并没有破坏平民英雄的形象，反而拉近观众的心理距离，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英雄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经历流血和牺牲，也会面临道德和情感的抉择。（刘念，2017，p.86）这种贴近现实的塑造方式，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与可信度，使观众在感动之余，也能对英雄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除《战狼II》和《湄公河行动》以外，近十年来还有许多中国主流电影在人物设置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特别是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如《夺冠》（2020年）《我和我的姐姐》（2021年）《你好，李焕英》（2021年）《热辣滚烫》（2024年）等影片打破传统叙事模式，将女性角色置于影片的核心位置，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或陪衬，而是成为了拥有独立思想、鲜明个性和自主行动能力的主体。一方面，女性视角的独特性能够为故事增添新的维度，展现更多元的情感和生活体验，激发观众更为深刻的共鸣与反思。另一方面，这类作品还引发了观众对女性角色和性别议题的关注和讨论，进而推动社会文化向着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方向发展。

（二）“微宏叙事”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主流电影的权威性深受官方叙事立场与视角的影响。鉴于主流电影的核心使命在于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在于确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正当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倡导爱国主义精神等，因此，主流电影采纳的官方立场与视角，决定了其叙事主旨需与官方需求及统治理念相契合，确保电影通过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对观众进行陶冶与心灵净化。

在“十七年”期间的国产主旋律影片中，英雄叙事模式（如《青春之歌》（1959年）《英雄儿女》（1964年））及战争叙事模式（如《渡江侦察记》（1954年）《地道战》（1965年））占据主导地位。这类作品多采用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沿着故事发展的脉络正向推进剧情。其核心叙事逻辑在于：影片中所展现的战争行为本身即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而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则始终代表着道义上的制高点。从叙事本质而言，这类影片将战争冲突的实质转化为道德价值的对抗，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判断体系。这种叙事模式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精心设计的编剧策略，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观众接受特定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宣传功能。进入新世纪后，以《建党伟业》（2011年）《辛亥革命》（2011年）《甲午大海战》（2012年）《智取威虎山》（2014年）《战狼》（2015年）《红海行动》（2018年）等为代表的革命题材影片，在叙事核心逻辑上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但影片开始注重刻画人物的情感维度，展现出更具人情味的艺术表达，使得叙事更加贴近人性本质。

改革开放初期，传统主旋律电影惯常采用“超越个体层面的宏大叙事”来描绘特定社会的全貌。如以《开国大典》（1989年）和《大决战》三部曲为代表的经典主旋律影片，多采用“全知视角”与“英雄史诗”框架，以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特征与明确的政治叙事为导向，集中关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以及核心历史人物和事件。它们艺术创作的核心目标在于凸显国家主流价值观，特别注重其宣传教育功能的实现。因此，在历史还原与政治教育层面成就斐然。影片中常直接呈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诸如党旗、国旗的频繁展示，红歌的反复吟唱等；在人物塑造层面，则多聚焦于“崇高”形象，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表现模式。然而影片直白的说教与“道德神圣化”的英雄形象塑造虽符合政治需求，但往往削弱了文艺作品应有的艺术韵味，难以满足观影经验丰富的现代观众需求，市场接受度低迷，远低于同期商业片水平。利奥塔曾批判这种传统宏大叙事“以总体性压制差异性”，将个体经验消解与国家话语之中，造成了“双重割裂”——历史进程与个体生命的割裂、政治符号与情感共鸣的割裂。

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观众审美的多元化，国产主流影片已经呈现出“微宏叙事”转向的趋势。这是一种由个人话语与宏大叙事相结合而实现的叙事范式新变化。“宏大的‘中国叙事’电影不断走出拍摄的舒适区，在现实题材方面不断深入挖掘，不断展现时代洪流的横截面。”（张春、刘美淇，2021，p.3）经过市场不断磨砺、观众不断检验后，主流大片在呈现宏大叙事的同时，将主题深植于个体命运之中，运用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生动的生活细节，实现了国家民族轨迹与个人生活经历的紧密融合与相互映照，自然而然地传递着主流价值观。

在2019年国庆佳节之际，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致敬之作隆重登场，迅速在票房与观众评价上获得双丰收。该片精心挑选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历程中的七个标志性瞬间，在颂扬爱国主义精神主旨下，影片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框架，转而聚焦于生动具体的人物事迹与历史细节，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人物的鲜活。首个篇章《前夜》细腻地描绘了主人公林治远为确保国旗顺利升起，不顾个人恐高，毅然攀登至22.5米高的旗杆顶端，亲手修复电动升旗装置的场景。这一微观视角地刻画，让观众不仅深刻体会到开国大典光鲜背后所隐藏的艰辛与挑战，还意识到有这样一类人立志为立国大业，鞠躬尽瘁。紧接着的《相遇》篇章，虽简短却意味深长。它将背景设定于20世纪60年代的原子弹研发时期，却巧妙的以爱情为叙事主线，叙述了工程师高远与恋人方敏久别重逢的故事，映射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普通中国人情感的纯真与坚韧。《夺冠》

篇章虽以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为引子，实则更多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普通民众的生活面貌，生动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精神面貌。在这个故事里，导演将视觉锁定在“电视天线维修工”冬冬身上，当冬冬身披床单化身“人肉天线”时，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记忆形成共振，个体行动成为国家荣耀的微观载体。这种去符号化的处理让爱国主义从一个抽象概念转变为可感可知的情感体验。当宏大叙事被分解成无数个“我”的故事，国家认同便获得了血肉之躯。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借助七个紧密相连的叙事篇章，以精湛的叙事技巧成功地实现了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全面呈现，深刻地揭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不再仅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存在，而是转变为了历史的直接经历者与积极参与者。他们以生动而具体的形象展现于世，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世界——爱憎分明、悲喜交加、怀揣梦想且面临挑战。这样的艺术处理手法，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内涵，使电影更加生动、精彩，也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共鸣感与代入感。（周达玮，2019，p.26）

（三）各题材类型共同勾勒爱国主义多面图景

在我国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中，领袖传记、革命历程及英雄题材作品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类电影在创作上持续面临创作瓶颈。在大众文化的不断碰撞下，主流电影不断从现实题材方面进行深入挖掘，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借助科技赋能，开创主流电影题材、形式新趋向。

近年来，特战电影、科幻电影作为主流大片新的主打类型，将个人情怀、英雄主义、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在正面表达普世情感的同时兼具国际视野，获得了不凡的成绩。类型的拓展对主流价值观电影的广泛传播产生积极作用，警匪片、爱情片、灾难片、惊险片、武侠片等各种类型片的元素都在主流电影中有所体现。吴京执导的《战狼》系列影片，以青年受众偏好的手法，生动诠释英雄主义与爱国情怀，巧妙融合国际安全局势、军事文化素养于本土化、通俗化叙述，深度探索军事题材电影的新维度；警匪动作片《湄公河行动》妥善融合港式人文理念与主流价值观念，创造性地展现全新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影片《攀登者》在聚焦于重大历史时刻的同时，巧妙穿插爱情线索，鲜活呈现了历史的另一维度；而影片《我和我的家乡》采用了短片集合的表现形式，融合了改善民生、脱贫攻坚、教育等多重议题，借助非典型英雄式的普通人物作为叙事载体，巧妙地缩短了传统主旋律影片中人物“高尚性”与“亲和力”之间的距离，在一种轻松诙谐的叙事氛围中，循序渐进地揭露并深化了作品背后宏大的叙事主题与深层意蕴。

除了题材上的变化，新世纪新十年中的主流大片还采用了新形式来构建影片，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金刚川》以不同视角展现了对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不同理解；《厉害了，我的国》首度以影像纪实手法，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设的重大成就；电影《八佰》巧妙地利用了一道天然的界限与隔阂——苏州河，以一种截然分明且强有力的姿态，将民众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类是性格迥异却又都灰头土脸的正规军和散兵，另一类是以教授、戏曲演员、赌场老板为代表的普通百姓。电影中，战争爆发前夕的散兵群体初步显露了对异国侵略者的惊慌、对战事爆发的畏惧以及对生命消逝的极度恐慌，这一状态与那些展现出无畏精神的正规部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图景。随着战事局势的逐步演进与深化，这些散兵逐渐被正规军展现出的坚定不移与顽强抗争精神所触动，内心深处萌生出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之感。继而，他们开始逐一战胜潜藏于心的恐惧情绪，以崭新的勇气面貌，重新投身于战斗之中，展现出一种蜕变后的英勇姿态。从“逃离”到“对抗”，

从“逃避”的姿态转向“抗争”的行动，再由“袖手旁观”的态度转变为“援助困苦”的义举，散兵们克服内心的胆怯，实现了个人的蜕变与成长。而影片中的另一类主体——普通百姓一开始以集会的形式聚集在河岸另一侧，轻言目睹着同胞遭受日军无情屠戮的惨状。当看着身负炸药、誓死以肉身筑起防线抵抗敌军攻势的战士们接连倒下，民众的情感也经历着剧烈的起伏波动。影片尾声，八百壮士撤退之际，对岸那些作为旁观者的民众被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家国责任所唤醒，纷纷采取行动，冲破重重阻碍，将士兵们安全转移至彼岸。至此，苏州河岸上的百姓彻底完成了爱国意识的觉醒，苏州河这条分界线在情感和意志层面逐渐弥合。伴随着那句掷地有声的台词：“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观众也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启示，最终完成了对家国认同这一意识形态的“召唤”与内化。（宿傲男，2021，p.40）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20）指出：“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运用艺术形式和新媒体，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这一指导思想不仅为中国主流电影指明了发展方向，更为其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内涵。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主流电影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机械走向灵活。在政策、市场、文化和技术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新时期的主流大片不再一味地进行煽情和说教，而是深谙年轻观众的喜好，重视观众的观影需求，将宏大的主题解构在碎片化、细节化、生活化的互动情境之中，通过强调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标志和精神内核、展示人物的精神高度与思想境界，并结合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创新性表达，使受众对符号化的文化价值表示认同，赋予虚拟的故事一种真实感，从而建立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有效连接，并由此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使影片得到最大化的情感回报。

当前，中国电影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正向质量提升与内涵深化的发展路径迈进，对高品质作品的需求愈发迫切，这也为主流大片的繁荣提供了发展的“良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主流电影创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需要规避的潜在风险。当前，主流电影创作中仍然存在“大片综合症”的潜在风险。这类影片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获得较高的票房收益，但其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容易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例如，近年来一些主打特效和明星阵容的商业大片，如《长城》（2016年）《上海堡垒》（2019年）等在上映初期虽然吸引了大量观众，但由于故事逻辑松散、人物塑造单薄，最终口碑和票房表现双双失准。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主流电影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眼球经济”的层面，而应该更加注重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资本或商业力量的过度干预也是当前主流电影需要警惕的问题。在当前的电影产业环境中，资本的逐利性有时会与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产生冲突。一些制片方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对影片的主题和价值观进行过度包装，甚至偏离创作初衷。例如，电影《大闹天竺》（2017年）原本是一部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奇幻喜剧片，但在拍摄过程中因投资方的干预，将影片改编成了一部充斥着无厘头搞笑和商业植入的作品，导致影片的文化厚度和思想深度大打折扣。这种做法不仅影响影片的艺术质量，还损害了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让观众对国产主流电影产生了不信任感。

传播文化价值是优秀主流电影的内在驱动力。为避免以上问题的发生,中国电影在创新表达的同时必须要扎根人民、内容为王。主流电影创作者需深入生活、了解人民,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同时,他们还需要注重内容创作的深度和广度,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来打动观众。只有这样,主流电影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进而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贾磊磊(2007): “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当代电影》(03):24-28。
- [Jia Leilei (2007). “The Spiritual Map of Chinese Cinema - On the Path of Mainstream Cinema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Core Values.” *Contemporary Cinema* (03):24-28.]
- 刘念(2007): “《湄公河行动》中的平民英雄形象塑造”, 《电影文学》(06):85-87。
- [Liu, Nian (2007). “The Portrayal of Civilian Heroes in *Operation Mekong*.” *Film Literature* (06):85-87.]
- 饶曙光、李国聪(2017): “主流大片新拓展:范式转换与战略升级”, 《当代电影》(01):19-23。
- [Rao Shuguang, Li Guocong (2017). “The New Expansion of Mainstream Blockbusters: Paradigm Shift and Strategic Upgrade.” *Contemporary Cinema* (01):19-23.]
- 宿傲男(2021): “从凝视到审思:《八佰》中家国情怀的深蕴与张扬”, 《视听》(10):39-40。
- [Su Aonan (2021). “From Gaze to Contemplation: The Depth and Expansion of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in *Ya Bai*.” *Audiovisual* (10):39-40.]
-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学习读本编写组编(2020):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
-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mplementation Program Study Reading Book Preparation Group (Ed.) (2020). *Study Book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am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尹鸿、梁君健(2018): “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7):82-87。
- [Yin Hong, Liang Junjian (2018). “New Mainstream Movie Theory: The Merging of Mainstream Value and Mainstream Market.”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07):82-87.]
- 周斌(2012): “关于中国主流电影的理论探讨”, 《当代电影》(01):48-52。
- [Zhou, Bin (2012).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Chinese Mainstream Cinema.” *Contemporary Cinema* (01):48-52.]
- 周达玮(2019): “《我和我的祖国》: 家国情怀的个体书写”, 《艺苑》(06):25-27。
- [Zhou Dayi (2019). “*Me and My Mother Land*: Individual Writing of Family and National Sentiment.” *Arts* (06):25-27.]
- 张春, 刘美淇(2021): “从主旋律到新主流:中国叙事的变与不变”, 《电影文学》(16):3-6。
- [Zhang Chun, Liu Meiqi (2021). “From Melodrama to the New Mainstream: Change and Constancy in Chinese Narratives.” *Film Literature* (16): 3-6.]